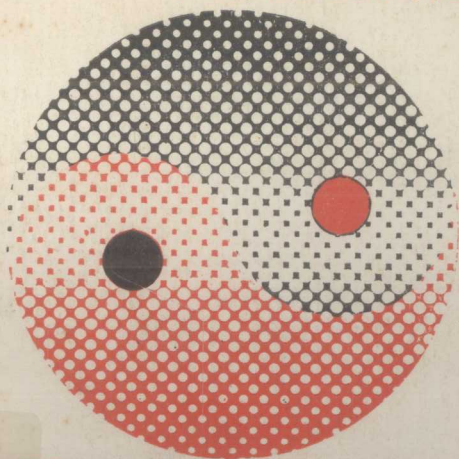


● 姚蜀平 编著

现代化与 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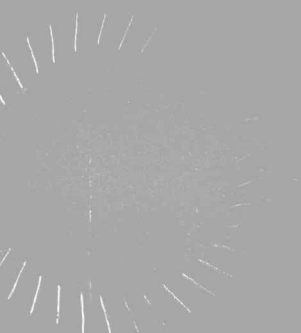
—李敖、柏杨及其他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

姚蜀平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圣教、习俗及其他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
——李敖、柏杨及其他
姚蜀平 编 著
责任编辑：李思远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70000 印数：1——2800

ISBN7—217—00421—7

I·174 定价：2.65 元

湘人：88—10

序 言

作为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深深自豪，似乎成为一种传统。不管是真实感情，是习惯势力或是为了应付门面，人们都这样做，它成为人的各种感情中最可尊敬的，因为它和爱国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又和人的自尊心、求胜心、虚荣心联系在一起，人的这种情操从来是被歌颂的，被肯定的。几十年前，鲁迅冒天下之大不韪，抨击了中国人自己，人们第一次看到撕下面具的中国人，他们感到震惊和不惑，静下来一想，睁开眼睛向四周一看，不免大喝一声：哈，对呀，这种人着实不少呢！阿Q变成了一个代名词，这一文学作品塑造出的人物震撼了自尊心极强却又受到深深伤害的中国人，他从思想到行为规范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最近几十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是人民当家作主，因为是一个旧朝代被推翻后的新政权执政，建立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有现实意义，它是巩固新政权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在被封锁、被孤立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所必要的一种心理需求。因此，在这三十多年里，鲁迅批判过的那种中国人似乎已成了上个朝代的人，中国人的种种恶习似乎只残留在某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

上，因此，他们特别需要改造，但是，整个民族似乎已经脱胎换骨了。对中国人以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份批评，都可能会被上纲到对新政权、对社会制度、对爱国主义的不恭上。因此，人们除了在自我检查中会莫名其妙地无限上纲而外，对于我们民族以及社会上的人的深刻剖析却不多见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十年，由于造反、由于失控、由于经济的、社会的及其他的原由，冲击了道德规范和传统价值，赤裸裸的中国人的本性表露无遗的时候，我们强烈感到社会的踌躇不前，感到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对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对于当今和未来社会要求我们的，应该再次深思。

就在这时候，我到了美国，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接触到了李敖和柏杨的著作。李敖、柏杨在台湾，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几十本书中象是藏着无数把匕首，刺向那些使我们恼怒和抱怨的，那些显而易见或隐隐约约感触到的，那些陈旧和新生的，那些我们不愿承认却又明明存在的种种的中国人的恶习、陋俗和坏毛病。

这种切肤的批评，无情的指责和尖刻的笔触，看了令人冒汗，令人咋舌，也令人心悸。透过炽烈燃烧的字句，我们看到的是两颗祈求中国上进的真诚之心，他们过火的话语是为了让人猛醒，也确实使人有难得的彻悟之感，我们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文章了，也不大会这样讲话了，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真正能这样讲话的人也不多了，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总觉得这些感受不会只是我特有的，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我的激动，我的猛醒和由此产生的联想和深思。因此，回国后，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我介绍了这两个人和他们的一些作品，同学们将讲话印了出来，它传到许多人手中，找我的人愈来愈多，想要看到他们其他作品的要求愈来愈强。于是，我萌发了更多地介绍一些他们的著作和观点的想法，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所有观点，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我们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源于同一文化，同一祖先，我们是同一国家但不同制度下的人民，他们的肺腑之言对我们不无帮助和启发。因此，我决心来做这件事。

但是，困难是不少的，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在这里找不到，我带回来的又极有限。凑巧的是，在我决定写这本书之后，我又有两次机会到美国，再次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又一次阅读了他们的著作，收集了素材，而李敖的老同学潘教授和柏杨的好友郑教授也为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或送给我一些一时买不到的书。当湖南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书时，我提出了这个题材，很快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我开始了这一工作。

由于李敖、柏杨两人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恶习的猛烈抨击。因此，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次介绍他们时，也谈到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1986年夏天，在承德的一次暑期讲习班上，我以“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为题作了一次演讲，应该声明，这并非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国外及香港、台湾学者有关现代化的一些理论，听众的热情使我决心把它作为本书的第三部分一起奉献给读者。我想，此书尽管前后形式不尽相同，但

主题一脉相承，不妨让它们一起出笼，供读者参考。

在此，应该声明的是，我编写此书，并没有征得李敖柏杨二位先生的同意，但我相信，让十亿中国人民了解他们，阅读他们的作品，不会是坏事，那么热爱中国，盼望中国富强的人，也一定会热爱十亿中国人民的。在此，也谨向李敖、柏杨二位先生表示歉意和敬意。同时，我借此机会，向所有鼓励我编写此书的朋友们，热心给我帮助的人们，对出版社编辑的真诚相待，对耐心的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作 者

1986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编 李敖及其思想

第一章 李敖概况.....	1
第二章 李敖论中西文化.....	20
第三章 李敖论知识分子.....	47
第四章 民主自由的斗士.....	58
第五章 结语.....	78

第二编 柏杨及其思想

第六章 柏杨概况.....	83
第七章 柏杨谈酱缸文化.....	99
第八章 丑陋的中国人.....	119
第九章 中国人的前途.....	138
第十章 《中国人史纲》.....	145
第十一章 柏杨出狱后的著作.....	165
第十二章 结语.....	176

第三编 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

第十三章	现代化的内涵·····	181
第十四章	为什么现代化需要伴随着文化的变迁···	197
第十五章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204
第十六章	文化变迁中遇到的困难·····	214
第十七章	现代化必需的文化变迁的实质内容·····	223
第十八章	怎样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变迁·····	241
第十九章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259
参考书目	·····	268

第一章 李敖概况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文坛出现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老年人和棒子》。从此，该文作者李敖，在台湾文坛纵横捭阖二十多年，以他犀利如刀的笔触、入木三分的透视力、天马行空的气魄和倏然独立的勇气，对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现象，对执政的国民党，无情地批判和揭露。他激励了一些人，也触怒了另一些人，李敖被关进监狱，但他出狱后，文章比以前更多、更尖刻、更深邃，李敖成为台湾社会抹杀不掉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在台湾是一个“放火的”、“以写讽世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

李敖是这样评论自己的：“李敖是最受争议的风云人物，他是顽童，是战士，是英雄，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痛恨国民党和伪君子的第一真人，中国有史以来，没有人能像我这样集正义、力量、勇气、真诚、血性、

智慧、博学和活泼于一身的人了。”

李敖，祖籍山东，1935年4月2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37年，因不愿做亡国奴，举家迁至北平，七岁时，入北平新鲜胡同小学读书，至1948年小学毕业，同年，以第一名考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后转入上海。1949年，在上海入缉縈中学，重念初一，同年四月，随父母到台湾。

1953年，读高三时，念了一个多星期，即自愿休学在家，博览群书，次年以同等学历考入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1955年6月，自动休学，重新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1959年毕业后，参加为时三年的预备军官训练。

1961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一年级，开始主编《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1963年自动休学，同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

1965年，在《文星》第九十八期上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批评国民党，《文星》遭查封。

1971年，以“台独”罪名，被捕入狱，直到1976年底，获释出狱。曾在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任副研究员一年，以后继续写作。1980年，《李敖全集》开始出版，同年与著名电影演员胡茵梦结婚，半年后离婚。

1981年8月再度入狱，入狱后开始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82年2月出狱，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

现在，李敖“满腹经纶，一身傲骨，艺高人胆大，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拚命三郎，虎口捋须、太岁

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出千秋评论一册。”

李敖在中学时代，如饥似渴地读书，甚至一场电影也没看过，直到今天，他仍保持不看电视的习惯，不是嫌电视内容全要不得，而是因为它陪你养成一个坏习惯——一个不能主动生活的坏习惯。它把你有限的精神和时间给抢走，抢走还不算，还割得鸡零狗碎，使你简直无法过一个奋发有为的生活。

高三时，李敖实在受不了那叫人窒息的教育气氛，决心消极抵抗——自由自在地涉猎群书。李敖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按李敖的话说，他“充分具备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于是，我蹲在家，痛痛快快的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事实上，李敖决非享乐之辈，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求知，而且做到活学活用。李敖在北京读书时，老师要他们背《木兰辞》，里面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老师解释说“唧唧”代表木兰织布机发出的声音。李敖说不对，而是木兰的叹息声音。老师问为什么，李敖说：你上次不是教过我们一篇《琵琶行》吗？里面说：“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所以“唧唧”代表叹息声，老师因此无话可说。其实，那时李敖读的古书并不多。书、知识对李敖的作用自不待说，他告诉别人：“我有一些本领，我的思想活泼，我的坏主意很多，都是从书里来的。”

正由于长年的积累，李敖装了满肚子学问，满脑子问题，他不仅精通中国历史，而且熟读外国历史和名著。痛恨李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李敖有学问。他的文字组织能力，他的资料运用能力，他的勤奋与博知，他的才华与慧黠，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事实。

李敖谈到对社会反省要想获得成功，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作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作一种目的。”

李敖的“无政治野心”，表现在他大学毕业后，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有两次例外，一次是1961年，李敖退伍归来，应老师姚从吾之邀，做了他的助理研究人员。可是，他对自己的这一选择产生了怀疑，他说：“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从此，他走上了以文谋生的路。

另一次是1976年李敖从监狱出来后，但这次任职则令人啼笑皆非。李敖当初以叛乱罪被判十年徒刑，外加背信冤狱判一年。1976年，国民党当局派李敖的老师吴俊才去监狱与他洽商，吴俊才查明背信冤狱确实是冤狱，经协商这一年就“不执行”了。吴俊才又向李敖提出，出狱后如能出任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则他因叛乱案的褫夺公权六年也可不了了之。李敖自我解嘲地想，国民党的政治，不过乃尔，就答应下来。

李敖在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任职十三个月，但全部上班时间不到十三小时，开始几个月的薪水，他送了人，后来干脆让研究中心把钱放在一个邮局里，而他又不去拿，最后，“不但拒绝研究、也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从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辞职后，吴俊才又邀请李敖出任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主笔，并准备接任总主笔，李敖又一次拒绝，他笑着说：“我不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

李敖无职无权，作为一个自由文人，唯一可利用的是手中的笔，“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成为台湾社会的风云人物。

1961年11月，李敖在《文星》杂志上发表《老年人和棒子》，文章从李敖和比他年长四十三岁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谈“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开始，李敖认为在活着的人里面，没有人能比老年人更适合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了，老年人从死人手中接下这根棒，由于他们身世各异，所收到的棒也各有不同：

第一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到这根棒，也许接到过后又丢了，他们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装老糊涂，他们的人生观是“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他们永远不会退化，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进化，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那一日就是早睡早起一日三餐……他们也未尝不想交点什么给青年人，可是他们一方面没有“避此人出一头地”的胸

襟，再一方面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妙手空空，对人劳心怛怛又有什么用？

第二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一般说来，老年人可疵议的地方不是落伍，而是落了伍却死不承认他落伍，落伍是当然的，可是死不承认就是顽固了……好像愈是在青年时代前进的人，愈是在老年到来冥顽不灵的人。……参加接力赛跑的人都知道接一个“走动不得”者的棒子的味儿，尤其是失败下来，他们竟还埋怨那些接棒的人，他们从来不肯自己反省，自己跑不快还要嫉妒青年人，说青年人不行。

第三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老年人对死亡感到恐惧，他发现什么东西都将在突然间不属于他，他不愿看到任何东西离他运去，因此人一到了老年，就显得贪心而小气，他们一方面殊求无厌；一方面“印刻敝忍不能予”，他们充满了舍我其谁的自信，一点没有成功不必在我的雅量……所以他们什么都想一把抓，什么都想求近功。

李敖说：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他们要我们苦干，至少他自己不躺在沙发上做学者；他要我们有骨气，至少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保千金躯”的乡愿；他要我们战斗，至少他自己要做《老人与海》里面的打渔人。

最后，李敖申明：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

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希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这篇使李敖崭露头角的文章，充分显示了他的胆略、功底和见识，我们也可从中看出年青时代的李敖和老一代人存在着多大的距离。由此，李敖开始了他的“文星时代。”

《文星》虽然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其实还是一家很普通的杂志。但自李敖任主编后，就不再是一般刊物了。李敖不甘寂寞，利用这一地盘，“从思想上挖他们的根。”

在一个高度政治取向的社会里，“思想”很难免不跟现实社会与政治碰撞。事实也是这样的，继雷震的《自由中国》之后，《文星》成为当时直接和国民党冲突的党外杂志。李敖发表的一系列批评国民党政治、法律的文章，使国民党感到恼火。1965年12月1日，李敖在《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错误行为，国民党的忍耐到了极限，二十五天后，《文星》被查封。

在《文星》查封后，李敖的书不断遭到查禁，而且警察开始“约谈”，受到跟踪、软禁，直到1971年被捕。

李敖被捕的罪名是“台独”，但实际上，李敖从来不是台独分子。台独方面希望把这个知名人士拉进去，表明搞台独的不仅仅是台湾人，也有外省人，而且是这样有名气的外省人；而国民党当局也想用其他的罪名把这个他们不喜欢的人

关进监狱。正如李敖所说：“他们很不愿意用压迫言论自由的罪名来抓人，他们给你换一个罪名，譬如柏杨是匪谍，李敖是台独。真正的原因却是你写文章时他们不高兴，可是他们又不愿意被看成压迫言论自由，所以就给你换另一个罪名。”

李敖在狱中收到了判决，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他说：“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我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六十年代争取言论自由，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从1971年3月19日到1976年11月19日，李敖蹲了五年八个月的监牢。他说：“《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程，凄楚而惨烈……”他是如何渡过这凄楚而惨烈的十四年呢？他写道：“人生横逆之来，一般人的反应是失望、是沮丧、是泄气、是抱怨、是发怒、是流泪、是惊讶，而我的反应，却是从横逆中立刻笑嘻嘻地打主意，由劣势变到优势，由危机得到转机，想法子‘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最后从中取利。”

李敖从这五年八个月中取的利就是增加了对国民党的认识和随之而来的仇恨。

出狱后，李敖继续写作，《李敖文存》二集就是这个时候完成的。